
第一章

如何萌蘖



第一節 卓爾不群論鐵抗

提要：鐵抗是馬華文學史上，尤其是戰前五年最傑出的作家，他兼擅文學理論與創作實踐。從理論演進角度看，他大致上可被納入現實主義思潮：一方面他強調對馬華文藝的現實化處理，而在抗戰壓力日蹙後，他更主張文以載道與踐行，比如文藝通俗化、文藝通訊與報告文學等等，另一方面在對本土詩學的曖昧堅守中，他亦有不少可以闡發的洞見；文學實踐上，他長於反諷，又善抒情，同時又能採用橫斷面的手法敘事，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。

關鍵詞：鐵抗；現實化；超族際；本土詩學

鐵抗，原名鄭卓群，出生於廣東潮陽，曾用名鐵亢、明珠、金鐵皆鳴、金箭、金鑒、鳴珠、群等。1936年冬，鐵抗南來馬來亞，在民眾學校教書，並主編《星洲日報》服務版，1937–1938年接編《星洲日報》、《文藝》週刊，1939年編輯《總彙報》副刊〈世紀風〉，並同時與友人創辦並主持《文藝長城》，1940年赴馬來亞吡叻州（或霹靂州）邦咯島（Pulau Pangkor）各地教書，1941年底返回新加坡，不久星洲淪陷，1942年2月鐵抗於日本人“檢證”¹時被捕並慘遭殺害，年僅29歲。

馬來亞文學時空中的鐵抗存在時間只有短短五年，但他卻是馬華文學星空（尤其是早期時段）中璀璨的一顆明星。在這五年內他筆耕不輟，先後嘗試過各種文體：如散文、隨筆、短篇小說、中篇小說《試煉時代》、文學短論及文學批評論集，除此以外，他也寫過通訊、劇本等等。²大致而言，他的作品大多收入方修主編的《鐵抗作品選》、駱明主編的《鐵抗研究專集》（新加坡：新加坡文藝協會，2006）中。毋庸諱言，鐵抗具有彗星般的氣質，也受到及時的關

1 有關文學性描述可參余雪田〈新加坡檢證大屠殺〉，《海內與海外》1997年第12期；有關論文可參李恩涵〈1942年初日本軍佔領星洲“檢證”之役考實〉，新加坡《南洋學報》第41卷1、2期（1986年），頁1-21。

2 方修〈前言〉，方修主編《鐵抗作品選》（新加坡：上海書局，1979），頁1-4。

注，如人所論，“鐵抗當時可能不會知道，他的長眠之所，竟是這片逗留三五年的陌生地；他當時可能也不會知道，就因為這三年五載，文學史將他的定位給了這個地方——一個廣東潮陽地方來的年輕人，在三五年間成了馬華作家，而且還是文史家心目中極為重要的馬華作家”。¹

莊華興認為，我們應該出土鐵抗，“鐵抗於 1937 年初出現於馬華文壇，至 1942 年去世的五年光景中，留下幾篇傑出的小說和頗富洞見的理論文字，值得重視。出土鐵抗，是出土馬華詩學的部分壅拓性工程”。² 問題在於：如何出土？又如何呈現？

需要指出的是，鐵抗獻身文學的這五年，恰恰也是他血氣方剛、專心做事、努力開拓的時期，如人回憶所言，“他把文藝當作終身的事業，態度誠懇，許多文藝青年都學吸煙喝酒和打牌，把生命消磨在這些無謂的事情上，以為非此不足成為文學家，結果是文學家還做未成，而頹唐文人的惡習都染遍了”。³ 但同時卻又是他力比多 (libido) 找不到宣泄口⁴、刻意認真轉移的時期，因此彼時即使是現實主義的主流大潮亦無法遮蔽其洶湧的暗流跌宕，這體現在其文學理論的演進和變遷中，同時在他的理論和創作實踐之間難免既可能吻合，同時又有繁複張力和對抗。難能可貴的是，鐵抗兼擅創作和文藝評論，又相對有識見，他的豐富與部分駁雜其實有時也是對主流文學（史）觀（比如方修等）的挑戰乃至校正。鑒於前人論述相對富足，本文並不強調面面俱到，而是更側重其獨特之處，所謂卓爾不群而後又引領人群，也恰恰暗合了其原名鄭卓群。

1 張永修：〈屍骨沒了 文學挖掘未了〉，馬來西亞《南洋商報·南洋文藝》2000 年 7 月 15 日。

2 莊華興：〈出土詩學？——重讀鐵抗及其他〉，《南洋商報·南洋文藝》2000 年 7 月 22 日。

3 石蘊真：〈記鄭卓群〉，方修主編《鐵抗作品選》（新加坡：上海書局，1979），頁 137。

4 鐵抗在日本人“檢證”中的死亡原因眾說紛紜，“關於鐵抗的死因，鄭卓榮是從鐵抗朋友口中聽聞的。那是一般已為文藝界人士所相信的‘傳奇’死法：鐵抗通過了日軍的檢查，日軍要將檢印蓋在衣服背後時，鐵抗要求蓋在手巾上，觸怒日軍而被推到一邊——鄭卓榮說，推向一邊是生，推向另一邊是死——鐵抗被推到死亡的那一邊……鐵抗要求將檢印蓋在手巾上的‘異舉’，一般朋友解說為鐵抗潔癖所致。然而，鄭卓榮卻認為，潔癖應該只是部分因素。他相信，鐵抗拒絕衣服被蓋印，更大的原因是鐵抗根本就抗拒日軍的統治”。具體可參張永修〈屍骨沒了 文學挖掘未了〉，《南洋商報·南洋文藝》2000 年 7 月 15 日。但在我看來，也和青春力比多的失控有關。

一、理論演進：馬華現實化及其張力

整體而言，鐵抗的文學理論雖然有變化和發展，但在主流上屬“現實主義”範疇當無疑義，尤其是到了較後期的階段，他甚至大力提倡現實主義。如在1940年9月創作的〈馬華文藝現實化問題〉一文中，他就指出：“對於‘現實化’，或者說，馬華文藝的現實主義，即就到今日，還徘徊在個人主義濃煙中的作者，也未嘗而且不敢提出相反的抗論；這說明了整個文壇是朝著這方向走的；不過有的還依戀著過去，未曾越狹小的世界一步；有的認識不足，誤解‘現實’的意義，因而未曾把握現實的本質；有的則因環境的限制，不敢正視現實罷了。而走在這些的前面，作為馬華文藝的領導人的，無疑地是‘現實主義’。”¹ 這種論述肯定了當時文壇現實主義的先鋒地位，但作為一個較有個性 and 理論基礎的文藝工作者，他的文學理論堅守又有獨特和遠見卓識的元素。

（一）中國性現實主義

毋庸諱言，作為身在馬來亞的中國僑民，即使鐵抗有書寫“此時此地”的部分在地認同，但可以理解的是，他的現實主義中也難免具有相當強烈的中國性，這裏的中國性既有部分政治文化認同，同時也是對中國現實主義理論的移植。在他看來，儘管馬華文藝界和中國文藝界有差別和各自的特殊性，但亦有密切關聯，“因為馬華文藝是屬‘華僑’的，而華僑是中國人，因此馬華文藝自然隸屬於整個的中華民族文藝，成為她的一個重要部分，另一方面，因為華僑和祖國的同胞相仿，組成的社會不但同具封建的性質，而且在同一勢力之下……因此文藝在總運動目標方面，同樣是反侵略反封建的。也可以說：馬華文藝界配合著祖國文藝界的行動而執行她的任務”。²

甚至在〈馬華文藝的地方性〉一文中他也可以將地方性拓展到祖國（中國）的抗戰，“將祖國抗戰的題材加以組織，形象，置於馬華讀者（或觀者）面前，

1 參駱明主編《鐵抗研究專集》（新加坡：新加坡文藝協會，2006），頁205。

2 鐵抗：〈馬華文藝是什麼〉，駱明主編《鐵抗研究專集》（新加坡：新加坡文藝協會，2006），頁197。